

目 录

卫华新纱厂工人革命斗争史述略

.....桂文成 李 廉 任桂芬 (1)

豫西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片断回忆.....张 度 (19)

一代耆儒李敏修先生.....胡绍芬 耿玉儒 (31)

附录：读《毋自欺斋文字纪年》.....嵇文甫 (39)

忆先师嵇文甫先生.....任访秋 (41)

献身教育事业的林伯襄.....陈高衡 (45)

清末科举举考试制度概述.....魏少游 (58)

河南教育经费独立始末.....荣典岑 胡禹山 关超万 (73)

袁世凯在安阳的阴谋活动.....张润三 毕乃千 (80)

袁世凯为何要杀吴禄贞.....任芝铭 (92)

唐天喜气死袁世凯.....任芝铭 (95)

袁世凯轶事点滴.....任芝铭 (97)

关于郑发“寻兄”的所闻.....张仲青 (100)

关于郑发“寻兄”的点滴见闻.....李廷朗 (104)

关于郑发“寻兄”之事的补充.....编 者 (107)

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.....艾经武 (109)

回忆CC与复兴社斗争的一幕	张仲青 (116)
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	
第三班——临汝训练班	仲向白 (125)
解放前新乡蛋厂业发展情况	
.....	政协新乡市委委员会秘书处 (135)
我所知道的中国制蛋业发展概况	陈昭明 (140)
汴绣春秋	井鸿钧 (147)
一九一二——一九四九年河南省	
军政长官更迭一览表	刘亚荃 (153)
开封警节钩沉	陈雨门 (166)

卫辉华新纱厂工人革命斗争史述略

桂文成 李 廉 任桂芬

一九一八年周学熙（曾充北洋政府财政总长）、王锡彤（河南汲县人）等，首创华新纱厂于天津，继而在青岛、唐山、卫辉（今河南汲县）分别设华新纱厂，在天津意租界设华新纺织股份有限总公司，统一管理津、青、唐、卫四个厂。

卫辉华新纱厂自一九二一年开办以后，工人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，不断地向资本家进行斗争。为了保存过去斗争的史料，特邀请该厂老工人桂文成、李廉、任桂芬等口述亲身参加斗争的经历。下边是整理的记录材料。

资本家的剥削

一九二一年三月间，卫辉华新纱厂开工后，资本家在本地招收大量童工，并采取分化的办法，把两千多名童工，分为工人（为数不多）、艺徒（即养成工）和徒工三个等级，分配到每个车间，由大工头、二工头、小工头层层控制。徒工一般十二至十三岁，整天干活，厂方不管饭，每天六个小铜板，一年后再另行调整工资。艺徒一般十六至十八岁，厂方管饭，每月工资二角。他们吃的是陈小米、烂咸菜。工人的工资，起码每天是三角，就是一个工人的工资，相当徒工十倍。少用工人，多用徒工、艺工，资本家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。

由于艺徒们都是青年，干劲较大，厂方就培养他们学习技术，

• 1 •

成为养成工。虽较徒工稍有保障，但比徒工受的折磨多。资本家先将第一班男艺徒工一百名送往天津华新纱厂，并将女工五十余名送至济南鲁丰纱厂，分别学习技术。所有在厂中日常工作的艺徒和徒工，均受安阳所调来的二三百名工人管辖，这些人大部分被派为大工头、二工头、小工头，控制着这些艺徒和徒工。

第一班艺徒学习期限半年，昼夜班各工作十二小时，半月倒班一次，根本没有星期天。艺徒们被锁在一个大院中，不准随便外出，天天干活，可是资本家还嫌他们学习得慢。吃饭有数量限制。不仅没有福利可言，而且将原来一个月二角的工资也停发了。学习期满后，经艺徒们提出要求，在临返汲县前，才发给每人一元零用。回汲县后，厂方对这些艺徒们的伙食，每人每月按三元包饭。开饭时，凡是在班上的工人，在不停车的情况下，每人只发给两个馒头，一块咸菜，根本吃不饱。在上下班的时候，由班长率领，排队报数进厂，并有厂警押送，另外厂方还派有管理员，时常手拿竹板，横冲直撞，任意打人。

资本家对学习回来的艺徒们，借口扣还在外学习时的耗费，将原来每月二角的工资，从一九二二年三月到一九二三年四月，扣发一年有余。艺徒们虽然志愿书上写明三年为期，但三年期满后，仍不让出师。艺徒们群往质问，资本家说：“写是一回事，办又是一回事，”并用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说法，所谓“三年满，四年圆”，仍按艺徒待遇，迫使无偿劳动半年。

女工工资更少，无产假，车间即是哺乳房。徒工每十天一个休息日，没有请假制度。病了无人管，死了无人问，有的因在生育中发生工伤事故就被开除出厂。

自发斗争到成立工会

艺徒们以为学了技术回来，可以增加工资，结果连原有的每月二角钱工资也不发了。当时没有工会组织，在生活压迫下，就自发地向厂方斗争，如消极怠工，损毁机器，提出抗议，打资本家，罢工等等。

一九二三年五月，为了要求发工资，艺徒罢工十二小时。资本家非常恼怒，就集合讲话，说艺徒们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随便罢工，太胆大了。你不知道国家有禁令，不准工人罢工，罢工是要砍头的。如果以后再有罢工事情，首先拿班长问罪。由于资本家在生产上还得依靠这些初步掌握技术的艺徒，就采用威胁利诱的办法，两天后宣布每人每月工资五角。这是艺徒们斗争的初步胜利。

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政变后，国民第二军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到了河南，因为他们与国民党有一定的联系，且当时在国共合作期间，便有中共党员罗士伟、高凤、陈九鼎等同志，先后到汲县开展工作，以华新纱厂为活动重点。先分别联系工人，建立感情，逐步灌输革命道理。先后结识了工人宋光明、王殿臣、石中金等，并通过他们的介绍，以扫地、推车等杂务工人的面貌，参加纱厂工作，从而更广泛地接触工人。先后在工人中发展宋光明、吴庆生、苏际云、石中金、王殿臣、刘海珠等为中共党员，成立了几个党小组。

一九二五年夏季，由王三、高凤、涂克勤（女）和南某等四个人，在延寿宫开始筹备纱厂工会。经过宣传，几天后，报名参加的有一千七百余名（有些是被资本家收买的），便在山神庙街姜家院内，正式成立工会，推选张永成为会长，王士相为副会长，

设秘书、交际、青工、妇女、会计、庶务、纠察等部门。工会还组织了工人俱乐部，作为工人休息娱乐的场所。几个月后，大部分青年工人又参加了共青团。他们利用下班时间，不断开小组会，隔些时开一次大会，讲些革命道理，以工人们反对资本家压迫的斗争事实，启发阶级觉悟，提高思想认识。这便是华新纱厂工人接受革命道理，参加革命斗争的开始。

共产党领导下的罢工斗争

当时物价高涨，工资低微，工人们在恶劣的条件下，每天要劳动十二小时，绝大部分工人过着衣不蔽体，食不充饥的悲惨生活。

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，在中共党组织和工会的领导下，工人掀起了罢工斗争。在十一月二日下午六点交接班时，全厂关车停工，全体工人聚集在厂门口，中共地下党员和工人纠察队散发传单。这时，受资方收买的工人廖伯英、马静轩、左俊臣等，从中阻挠，抢去一部分传单，并要工人们立即解散。全体工人极为愤怒，喊着“打工贼”，随即拥上前去。廖伯英一面指示厂警向工人开枪恐吓，一面叫把大门关上。工人们不顾厂方的粗暴举动，高呼“打倒军阀”、“打倒工贼”、“打倒资本家”等口号。工人纠察队队长肖同善，副队长郭文合，带领队员郭顺、苏际云等，英勇地同厂警搏斗。经过一场激烈战斗，打伤厂警七人，缴获长枪七支，余皆逃跑。资本家等不敢再干涉工人集会，停工十二小时，次日才复工。资本家又运动政府于四月将工会副会长王士相、委员侯文喜等四人逮捕。这样一来，更激起工人们的愤怒，大家一致行动，于六日早晨，再次停车，仍趁换班时间，齐集大门口，准备游行示威。资本家赶快用电话通知政府予以制止。工

人们意志坚定，要求释放被捕人员，不达目的，决不要休。资本家与政府在这种正义斗争的威力下，不得不放出王士相等四人。斗争暂时告一段落。

这时，适有郑州工会方面派纠察队百余人来汲县协助工会工作。经中共党组织与他们商量后，即于十一月十七日，由工会副会长王士相代表全体工人，向经理吴伯生提出四项条件：

1. 工资问题：成包工入打一包加二厘，摇纱每车加五厘，全厂计时工三角以内者加八分，月工一律加二成。
2. 工作时间：每日减低为十小时。
3. 惩处问题：工人若犯厂规，由工会处理，厂方不准打骂工人。
4. 送饭问题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十二时，准许工人家属进厂送饭。

资本家不敢当场拒绝，答复研究后再议。十九日晨，工会又派三位代表进厂交涉，资本家一再借口拖延。代表们愤恨异常，限即日答复，否则全厂随时罢工。资本家即电请汲县驻军派兵到厂镇压。当时是国民第二军骑兵旅郑思成部驻汲县。郑用两面手法，一面支持纱厂工会的斗争，一面答应厂方请求，武力制止罢工，从中取得贿款。工会曾分析研究了下一步的对策，认为阻碍工运的，除资本家、反动政府和军阀外，一些工贼从中奔跑周旋，通风报密，也是工人们的对头。就决定先斗垮他们，去掉厂方的耳目和爪牙，孤立资本家。工会遂于当日下午二时，组织百余人，将工贼左俊臣、许宝田、郭景舜等，绑至工会，准备游街示众。资本家闻悉，即以大批款项，贿送郑思成，先派副官带兵到工会，将三个工贼劫走，并要求派兵一排，经常驻厂，监视工人行动。又暗派便衣队，在延寿宫街借故撞打王士相，使他身受

重伤，不能参与工会工作。对工人提出的条件，当时拒绝答复。工会于二十日早晨，正式宣布罢工。三天大罢工之后，资本家被迫接受要求，除第二条工作时间减为十一时半以外，其余三条均照办。这一斗争的胜利，大大鼓舞了工人们的斗争勇气，锻炼了工人人们的革命意志。

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，北方局面混乱。当局发布了取消人民言论自由，严禁群众集会结社的法令。中共党组织为对付当时的白色恐怖，决定工会暂停公开活动，党团活动也转入地下。这时，资本家指使左俊臣，加剧对工人的迫害。左经常捏造是非，陷害工人，凡经他告发的，轻则挨打，重则开除，甚至送县关押。一年多时间遭他陷害者不下数十人。工人们对于左极为愤恨。

一九二七年夏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进驻汲县。当时蒋、冯虽已合作，但冯还准许成立工会。在中共汲县县委书记张海峰领导下，首先恢复纱厂工会。会址设在纱厂西边关帝庙（今纱厂牛奶站）。选出吴庚生（共产党员）为会长，任桂芬等为委员，组成工会执行委员会。经过积极工作，很快发展会员一千七百余人。

七月间，利用一个星期日，把经常陷害工人的左俊臣绑起来，在工会门前广场上开斗争会。会后，给他戴上一顶高帽子，上书“工贼左俊臣”字样，由共产党员侯振邦牵着他游街示众。全厂工人在后边打着旗帜，浩浩荡荡拥上大街。并要左俊臣在游行途中自喊：“我是工贼！我叫左俊臣！我经常陷害工人，大家不要学我！”西北乡的农民协会、青年学生以及市民也参加游行。“打倒军阀！”“打倒工贼！”“劳工阶级万岁！”等口号声，此起彼伏，声震全城。沿途张贴标语。游行后，即通知厂方

限期将左俊臣驱逐出厂。

斗垮左俊臣后，又进一步向资本家展开斗争。以工会会长吴庆生等组成谈判小组，向资本家进行交涉。当时提出十条要求：

1. 提高工资百分之六十。
2. 工作时间实行三八制。
3. 不许无故开除工人。
4. 不准虐待工人，取消搜检制度。
5. 承认工会有管理工厂和代表工人的权利。
6. 建立饭厅、工人业余学校和工人俱乐部。
7. 星期日和纪念日，女工的产假，均照发工资。
8. 应发给全年不停工奖金。
9. 上次工会解散后，厂方无故开除的工人，应全部复工。
10. 工人与职员同样享受厂内红利及花包费。

以上各条提出后，副经理肖心斋说自己不能作主，须通过天津总管理处决定后，再行答复。但暗中企图利用吴庆生会长，分化工人组织。吴庆生严词拒绝，并警告肖心斋说：“不管复条件决不罢休。”资本家继续推拖，总是以天津总管理处尚未批回为借口。工人们识破了资本家的欺骗手法，决定在七月下旬罢工。罢工后的第三天下午，趁几个代表正在和资本家交涉时，汽笛一响，外边工人进厂，厂内工人都手拿铁棒，将资本家的办公厅包围。有的拥进室内，将窗户玻璃捣毁。肖心斋见势不好，向执委们表示，立即谈判。当即答应了如下条件：

1. 普增工资百分之五十，按元计算。
2. 工作时间改为每日十一小时。
3. 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，废除虐待工人制度。
4. 不再无故开除工人，现准复工九人。

5.全年不停工者准予给奖。

6.建立饭厅、工人业余学校和工人俱乐部。

7.星期日照发工资。

8.花包费可享受，至于红利，工人享受职员之半。

大罢工胜利结束。八月一日，马静轩等急电天津，报告此次罢工情况，请求总管理处增派得力人员来厂协助，借以保全纱厂财产。

资方破坏工会，酿成血案

第二次全体工人罢工斗争之后，副经理肖心斋及工务负责人马静轩，施用手段，破坏工会。先从挑拨离间、破坏工人团结入手。对工会副会长韩金元（安阳人），暗中贿通，秘密勾结。他们这些勾当，被工会执委会闻悉，随即开会，将韩金元罢免。韩怀恨在心，在资本家唆使之下，竟明目张胆地勾结粗细纱车间大把头王凤岐、郭景舜等，以地区关系作借口，声言工人中有汲县派、安阳派和上海、天津派等，并散布汲县派把权，歧视外乡人作事不公道等流言，煽惑群众，引起安阳人对工会的不满。资本家见时机到了，便唆使韩金元鼓动改组工会。因为他们人数较少，不易发动，即由韩金元、王凤岐、郭景舜等和资本家共同商量，去邀请白枪会。当时安阳一带有地主武装白枪会，他们曾在奉军败退时截获些武器，所以非常蛮横。由厂方出洋两千元，让韩金元到安阳去请白枪会来摧残工会组织。

八月中旬，白枪会百余人由安阳乘火车到汲县，每人手执白缨枪，队前打一面白旗，气势颇凶。在韩金元的指使下，先将工会纠察队队员张玉田捆走，声言“拿枪挑他”，作为威吓，随即将工会包围。王凤岐、郭景舜、韩金元带领白枪会的人到了工

会。韩金元质问执委们，工会为啥将他罢免，执委们答复是大家意见。韩、王、郭威逼工会马上出布告，开大会重新选举。当时执委们在他们的武力威胁下，不得不答应，随即打电话发通知，出布告，准备第二天召开工会大会，并邀请各机关派代表参加。这时，他们才释放了张玉田，离开工会，到工房住宿。当晚中共地下党即研究对策，认为目前可作策略的让步，以后组织好力量，再来反击。

次日上午，白枪会在工会门口和会场周围布置岗哨，一部分站在会场人群中。首先由吴庆生会长讲话。他总结了工会领导工人向资本家斗争取得的成绩，驳斥了工会不能为大家办事的说法，要求重新选举工会委员。在吴庆生讲话时，工人们在暗中互相转告：“白枪会如果动手，咱就几个人打一个人。”接着韩金元大模大样地说：“现在的工会，都是年轻孩子，办事不公道。为啥工会委员都是本地人，就我一个外地人还被罢免了！我看外地人办理工会，比现任委员要好得多。”当即重新选举，改组工会。选举在韩金元和白枪会的威胁下进行。工会原任委员吴庆生、赵金贵、任桂芬、缪光萃、肖同善、平居敬、侯振邦等均落选。当选人为韩金元、吕文汉、王锡纯等。散会后，即刻办理了移交手续。当日下午白枪会就要专车返回安阳，只留下两个人在华新纱厂工房，传授徒弟，并指定韩金元为点传师，吸收了几十名徒弟（都是安阳人）。

次日上午，吉鸿昌手下的一个团长率兵一营，从安阳到汲县来打白枪会。到纱厂后，便将工房包围，逢人就捆，一问是安阳人，认为是白枪会，就杀。在工房杀了九个人，其中有厨师一人，也被杀死。共捆绑了三百多工人，押往火车站，其中安阳人最多，汲县人也有。当在工房时，已探悉韩金元是白枪会头子，到

车站后，即问谁是韩金元，是否白枪会。韩金元答复了姓名，并说这些都是工人。韩金元被割去一只耳朵，受刑不过，承认自己是点传师，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弟。于是先将韩金元斩首，又在汲县车站杀了七十八人。

当时，中共地下党组织认为，绑去的数百人中，只有少数坏人（如韩金元等），大多数是受人愚弄参加白枪会的，决定由老工会会长吴庆生、委员任桂芬等三人为代表，赶往车站营救。这时，车站上已砍死了七十八人。三个代表找到团长，说明其中有不在白枪会的好工人等情由，经过努力交涉，该团长只准工会保回童工三十四人，其余的由汲县带至汤阴，沿途砍杀净尽。内有共产党员王殿臣、刘海珊。

当资本家勾引白枪会时，已获悉军队与白枪会有矛盾，及至白枪会到汲县破坏了工会后，又感觉大部分工人对白枪会非常愤恨，于是资本家竟想出借刀杀人的毒计，急电安阳，请十九师来汲县捕杀白枪会，借以讨好工人，冲淡他们对厂方的憎恨。同时催白枪会火速离厂，仅留下二人和王、郭二把头，躲在职员宿舍，免遭危险。资本家利用军队，不分青红皂白大量屠杀工人。这一大血案，乃是由恶毒的资本家一手造成的。

当天下午，县政府派人从车站把人头担回，将韩金元等十三个人头，挂在华新纱厂大门外槐树上示众。资本家大肆宣传军队与白枪会的矛盾，表明杀人事件与己无关。为了揭露资本家的阴谋，中共党组织决定恢复工会。恢复后的工会在吴庆生会长领导下，首先为无辜被杀的工人办理善后。他们去找资本家，指出血案是资本家一手制造的，不能推卸责任。迫使厂方对死者家属各给恤金五十元，并恢复了工人业余学校和工人俱乐部，又成立了篮球队等，工会又活跃起来了。

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，直鲁联军孙殿英部被冯玉祥部围困在汲县城内。当时因受战事影响，华新纱厂全部停工，不发工资，工人生活非常困难。中共党组织根据工人们当时的迫切要求，决定以吴庆生、赵金贵等为骨干，发动全体工人，向资本家要求围城期间照发工资。经过据理力争，结果按百分之七十五发给了工资。

经过不断的斗争，工人群众普遍认识到，惟有共产党和工会才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。

工人代表被捕

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七日，由汲县县长张启堂通知纱厂工会，召集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会，要纱厂工会委员一律参加。当时工会领导张海峰就很怀疑，认为不需要全体委员参加。正在讨论时，政府又派人来催，务必让全体委员都去，这就更意味着要扣人。工会决定，在执委和候补执委十一人中，让徐明哲、赵金贵、任桂芬、缪光华、石中金、平居敬等六人前往参加，并研究代表们如被扣留，工会如何行动等问题。

徐明哲等在当日下午二时到县府大礼堂开会。筹备会将结束时，即见军人在院中活动，大礼堂门口设有卫兵把守。县长张启堂宣布散会后，声言鹿总司令（即鹿钟麟）有电话来，要和纱厂执委们谈话，希望暂不要走。当机关代表走完后，六位纱厂代表被软禁起来。工会得悉代表们被扣，即组织工人一千余名，打着旗帜，呼着口号，向县政府抗议，请求释放代表。走到西门桥，城门已关闭，城上开枪，阻止游行队伍前进。军队让推代表进城交涉，工会就推肖同善、苏际云、洪亮、姜玉蓝、李书正、李殿秀、张俊杰、赵金河等十一人进城，后也被软禁起来。傍晚，将

被扣的人钉上脚镣，送进监狱。十八日，中共党组织发动工人，进行罢工斗争。在白色恐怖威胁下，罢工坚持七日之久，为被扣的代表作声援。二十日，县政府把工人代表解往郑州、开封。

成包工的斗争

一九二八年四月间，吴庆生在白色恐怖下，不得不暂时隐蔽。在国民党县党部的挟持下，纱厂另设工会。这个工会是黄色工会，主要负责人有张级三、张瀛、牛运昌、尚春林等。他们受纱厂经理董亨衢的指使，使用抬榜方式，淘汰工人，榜上有名者，进厂工作，发给出入证。凡是富有斗争性的工人，榜上一概无名。他们陆续抬榜，剔除，每一次即解雇工人二百余名。前后五年抬榜四次，共解雇八百余人。

黄色工会还将成包工每包八厘的工资，降低为五厘五，并增加工作时间，随即引起成包工人的反抗。成包工人因反对减低工资无效，都把证章交给黄色工会的牛运昌，不干了。牛反而向资本家说：成包工共四十余人，成不了什么事。同时又对工人们说：“每件工资虽然减少，但增加了工作时间，你们的收入，实际增多了。”而成包工表示，这样三个人的活让两个人干，裁减工人，我们决不同意。牛运昌就将成包工人的证章一律交给资本家。次日，资方即出布告威胁；牛运昌又以调解人姿态出现，劝大家不要闹了，再闹恐没有好处。工人们一致表示：“减工资就罢工，让上班就不能减工资”。这样僵持下去，由于工序互有联系，成包工不上班，影响到别的车间都不能干活，最后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要求，工人才上班。

叛徒告密与狱中斗争

一九二八年六月，中共汲县地下党委书记张海峰调省工作，由宋光明（纱厂工人）暂代。九月间，又派殷其雷负责领导。不久，被叛徒邵炳章告密，殷其雷被捕。九月二十四日，纱厂细纱工人、地下党通讯员吴耀卿，奉命赴开封参加职工联席会议，徒步至黄河口时，被冯玉祥部捕获。他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威胁与利诱下，供出中共河南省委、豫北党委和汲县党团委名单，致使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。

吴取得副官职位，由开封回到汲县，亲自带领军队，半夜到车间捕人。吴身披大衣，头戴套帽，掩蔽本来面貌。他向谁跟前一站，军队立即绑人。这样一连抓了四次，共抓去殷山元、周超、李天林、魏子功、焦长贵、张猫妞等九十三人。先后被捕的同志都送到开封关押，共有九百多人，大部分是地下工作人员。经彼此互相交谈和介绍，都接上了组织关系，其中有我厂四月间被捕的徐明哲等十七人。他们在狱中重新建立了组织，联合起来，向法官、监狱当局进行反压迫斗争。法官用尽了严刑拷打，也没有得到半点口供，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品质和英雄气概。狱中的同志还利用夜间阅读共产党的刊物和理论书籍，不断从思想上武装自己。他们还利用早晚放风的机会，彼此传播外边一些消息。一九二九年春夏之交，为反对监狱的压榨贪污，被捕人员进行第一次绝食斗争。当时每日两餐，每餐共发两个高粱小窝头和一碗稀汤。经过绝食斗争，饭食得到了改善。同年秋季，反动统治者不仅不让被捕人员互相谈话，甚至取消了放风。狱中进行第二次绝食斗争。当时向反动统治者提出五条要求：1.放风，2.改善生活，3.接见客人，4.洗澡，5.不准法警侮辱人。经过反复的

斗争，改善了待遇，锻炼了同志。

一九三〇年二月初，在第一监狱被押的政治犯，通过简单的审讯，被释放了。我们纱厂被捕工人，在监狱中牺牲的有张俊杰、姜玉兰二人。苏际云出狱后，被叛徒告密遇害。

改变斗争策略

自一九二八年成立黄色工会起，至一九二九年秋季，厂方前后解雇了四百多工人。他们规定：凡在厂工作一年以上者给十元，二年以上者给二十元，三年以上者给三十元。被解雇的工人不同意，曾向资本家提出抗议，黄色工会即出来当资方的走卒，经常叫警察武装镇压。这时中共党组织吸取过去教训，不推举代表。在群众中没有出头露面的人，有事大家担当，要干啥都干啥。资方一再让推选代表，进行商谈，大家拒绝推选。并且一致表示，厂方既不要我们，不让我们生活下去，我们啥都不怕。现在是要求增加解雇费，厂方给的太少，非加钱不可。厂方不解决问题，大家每天去抗议，逼得经理董亨衢只好答应要求，每人又补给十二元解雇费，才算结束了。

黄色工会充当资本家压榨工人的帮凶，订出一些苛刻条件：

- 1.增加工作时间：日班工作十一时半；夜班工作十二时。
- 2.原来的七天一礼拜，改成每十天休假一天。
- 3.取消夜班的夜餐费。
- 4.取消全年不休假奖。

以上条件和对各车间的具体方案，一经发表，尽管有厂警镇压，工人们仍以罢工来抗议。这次罢工，声势浩大，采取集体行动，说找经理都去找经理，说找工会都去找工会，说不上班都不上班。这样全厂一致，停工七天，各车间分头要求各车间的条

件，使资方应接不暇。经过交涉，最后资方只得让步，工人们又取得了胜利。其结果是：取消了黄色工会提出的苛刻条件，根据工人要求，参照资方条件，达成折中协议，提高部分工资，粗纱工少裁一些，细纱工多留一些，恢复七天休息一次的制度。

在这次斗争后，工人们采用消极抵抗的斗争方式，如各车间时常发生破坏机器，砸毁工具，以及打慢车的事件。大工头、二工头和技师们，都难以发现是谁搞的。因而不断改换新零件，修理车床，甚至还要停工。由于消极怠工，虽延长了工时，也不能增加生产，反而提高了成本，减少了利润。到一九三四年，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，中共党的地下组织在汲县停止活动。工人们失去了党的领导后，一直还以破坏机器等方式对资本家进行斗争。

工人们认为黄色工会是资本家的走狗，不能代表工人意志，拒交会费来抵抗它，以致黄色工会的脱产干部，无法开支，资本家便把厂内厕所的收入，拨给工会使用。工人们叫他们“大粪桶”。还有些工人暗中在工会大门上，抹屎撒尿。黄色工会中一个最坏的委员，曾被工人给他带金盔（用大粪扣在头上）。黄色工会在一九三三年停办了。

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活动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，日军侵入豫境，汲县形势危急。当时，有一战地服务团，由马步周率领，和防空委员孙伯英等来到汲县，他们深入群众，团结群众，也搞纱厂工会工作，大家都愿意靠拢他们。在他们的鼓舞下，又成立了纱厂工会。资本家恐慌了，就运动国民党县党部，由赵来亭代表县党部，到纱厂向工人训话，大加申斥。工人们当场高呼：“打倒赵来亭！”会场立刻混乱，赵乘机逃走，无人敢给资本家撑腰了。当时日本飞机不断来汲县